



政學系

編 斯 翰
版 出 社 版 出 南 華

本社出版新書預告

在舊的腐朽的中國政治史上記載了若干的政治派系的活動，這些派系在中國政治鬥爭中，過去扮演着甚麼角色？起着甚麼作用？現在扮演着甚麼角色？起着甚麼作用？在言論被統制，新聞被控制的情況下，我們是無從明瞭的。

那麼要明瞭中國政治鬥爭中的實況，就不能不讀「政治內幕」一類的書籍，難怪一般人都對「內幕新聞」發生很大的興趣。本社爲着適應廣大讀者的要求，特邀請熟悉中國政治內幕的作家，分撰下列諸書：

- (一) 民社黨內幕
- (二) 青年黨內幕
- (三) C·C系內幕

以上三書將於八月底出版，敬希讀者注意！

看 政學系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刊行

定價國幣

港幣

編 者 翰 斯

出版者 華南出版社

經售者 香港各大書局

國內各大書局

看政學系 目次

緒言

一 政學系的形成

不光榮的起家

拾出岑春煊做偶像

分化中間黨

一羣無恥的讀書人

二 政學系的活動

做了軍閥的寵兒

到革命陣營裏投機

促成革命陣線的分裂

「北伐」被出賣了

三 政學系所幹的勾當

做帝國主義的走狗

創子手幫兇——楊永泰

包辦親日外交

等待時機

政學系的喉舌——『大公報』

四 政學系大顯身手

..... 一五一—一七

爬上政治舞台上的——羣

戰敗了C·C系

第二次的勝利

五 政學系頭子張羣走鴻運

..... 一八一—二四

張羣這個角色

玩弄的把戲

赴美『探行情』

張羣的收獲和失敗

C·C系進攻政學系

打擊到王世杰的頭上

蔣主席溺愛政學系

六 張羣失掉了政治資本

..... 二五一—二九

粉墨登場

張羣的算盤

C·C系的『順應潮』

C·C系的勝利

張羣走向絕路

七 政學系的經濟基礎……………三〇—三五

政學系官僚資本的萌芽

北四行的興起

南五行的滲入

八 政學系官僚資本的中落與興起……………三六—四四

北伐後的中落

藉抗戰擴充實力

勝利後的接收戰

兩張財權的野心

九 結論——政學系的本質……………四五—四六

緒言

熟悉中國政治實際情況的，無人不曉得有個政學系，雖然政學系沒有明文的政治綱和政策，雖然政學系分子否認政學系這個名稱。但實際是存在的，是在活動着，而且有相當大的勢力。

政學系溯源於民國初年，當時有一班政客爲了仰承軍閥的鼻息，組織了政學會。會中著名的人物有：李根源、張耀曾、楊永泰、張羣、吳鼎昌等。政學會是以後政學系的前身。

北伐前後，楊永泰儼然成了政學系的首腦。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楊氏原想獲取一個立法委員的職位，但爲當時的立法院長胡漢民所拒絕。

不久，楊永泰經介紹得任蔣委員長南昌行營的祕書長。楊爲人深於謀慮，長於詞應，沒有多久，就深得蔣委員長的信任而且倚重他了。

此際，政學系的人物也都爬上了政治舞台，煊赫一時。如：黃郛任外交部長，黃紹雄任內政部長，張羣、熊式輝、陳儀、劉鎮華等皆各踞要津。

民國廿五年，楊永泰在主鄂期中被刺殞命，之後黃郛、劉鎮華等復相繼死去，政學系沉寂了一個時期。抗戰的第四個年頭，政學系的人物，東山再起了，張羣隱然是該系的領袖，熊式輝、吳鼎昌、翁文灝、陳儀等又是各踞要津。直至抗戰勝利，政學系的人物都是十分煊赫的。

政學系在經濟方面的據點，要推北四行，在北四行中，金城銀行是吳鼎昌的重要事業之一。政學系通過金城銀行去支配北四行。

在國民政府的四行兩局未有組成之前，北四行是中國金融界「半官半民」式的獨占組織，在華北的工商界和金融界，它具有很大的權威。

在政府的銀行中，交通銀行的錢薪之是與政學系非常接近的，而張嘉璈在中國銀行也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在工礦事業中，政學系也有不小的基礎。當翁文灝長經濟部時，整個資源委員會爲政學系所掌握（直至現

在，在資源委員會中，仍充滿了政學系的幹部；當吳鼎昌主貴州時，政學系的勢力，控制着「貴州企業公司」；陳儀主福建時，壟斷全省的工商業，到了任台灣行政長官時，更威風了，中央銀行的鈔票被他擋在台灣大門以外，台幣跟法幣分庭抗禮。並且獨占糖業、石油業、造紙業、肥料業、製碱業等。

在出版業方面，『大公報』與政學系有着血肉的關聯，吳鼎昌就是『大公報』創始人之一，實際他是這個報紙的後台老闆。

以上是政學系的全貌，本書都有很詳盡的敘述和精闢的分析。我們認為政學系的做法比四大家族——蔣、宋、孔、陳——聰明得多，在表面上，他們好像在幹事業，實際乃是擴大政治勢力，和發展官僚資本。政學系的厲害，就在這裏。

一 政學系的形成

不光榮的起家

民國四年，袁世凱想做皇帝，羣情憤慨，紛起討伐，結果，一氣送掉了性命。袁死後，北方留下段祺瑞，大權在握，南方則有軍務院，由唐繼堯、梁啟超等組織成立，不久軍務院自動撤銷，南北議和，於是被袁世凱解散了的國會，又在北京開會了。

在這時期，黨派活躍，一方面，有梁啟超、湯化龍等組織了的研究系，一方面李根源等在日本成立的「歐事研究會」，很想出來一試，可是，沒有成功，結果，張繼就以舊國民黨員的資格，號召成立「憲政研究會」。

「憲政研究會」裏面分子複雜，派系很多，最著名的有「客廬系」，以張繼、王正廷、吳景濂、谷鍾秀、張耀曾等爲主要人物，有「內辰俱樂部」以林森、居正等爲主要人物，有「韜園」系，以舊進步黨人孫洪伊、丁世嶧、溫世霖爲主要人物，派系林立，力量亦就分散，所以，在國會裏，趕不上研究系活躍，研究系和段祺瑞勾結，聲勢亦大，憲政研究會的人，漸漸動搖，一些不堅定的政客，就另想辦法了。

當時李根源、張耀曾、谷鍾秀等就聲明脫離「客廬系」，另行成立「政學會」，且爲「憲政研究會」裏面的右派，目的在擁護段祺瑞，乘機培養自己力量，這「政學會」就是政學系的前身了。

抬出岑春煊做偶像

段祺瑞繼承了袁世凱的地位後，就勾結日本軍閥，並且借了大批外債，準備來打內戰，於是，對內益加專橫，武力統治的野心，亦愈越明白了。

中山先生看出這點，就在廣州成立軍政府，高舉護法旗幟，反對北方軍閥的舉動。

軍政府的根据地是兩廣，那時的實力派是唐繼堯與陸榮廷，軍政府以中山先生爲大元帥，陸榮廷、唐繼堯

爲元帥，他們兩人的反對段祺瑞，並不是真心爲了護法，而是在私人利祿上沒有滿足的緣故，所以，軍政府雖然成立，大權却在他們手裏。軍政府祇不過是個形式。

政學會自脫離客廳系後，在國會裏就幫段祺瑞講話，但是研究系和段祺瑞因歷史關係，捧場十分露骨，段祺瑞對研究系的寵愛，自然超過政學會，因此政學會是不舒服的，所以時時尋找更好的機會。此時見到南方軍政府成立，而且軍閥陸榮廷、唐繼堯當了權，於是，心機一動，連忙抬出岑春煊，拿他做偶像，因爲，岑春煊是陸榮廷的上師，唐繼堯也做過岑春煊的部下，把岑春煊抬出來，確是好策略，這麼一來，西南實力派就此勾結，李根源可以隱在後面指使一切，良機莫失，於是就決計到南方來了。

分化中間黨

政學會通過岑春煊的關係，到了南方，李根源就活躍起來了，當時政學會是非常國會中的極右黨，另有民友系是極左黨，由中山先生的中華革命黨作中堅，益友系爲中間黨，三黨人數，大致相等，所以政學會雖與滇桂軍人唐繼堯、陸榮廷勾結，但在非常國會裏若不取得中間黨的援助，則就無法控制國會。當時，政學會雖然加入了軍政府，標榜護法，但是骨子裏却是想來控制軍政府，準備做筆政治買賣的。所以，李根源一方面勾結實力派，一方面就從中間黨裏下功夫，分化中間黨，拉攏中間黨的猶豫分子，爭取多數，於是就控制了國會。控制了國會，控制了軍政府，這樣，自己的地位增高，和北方軍閥做買賣的價錢，自然也就提高了。

非常國會被政學會控制了以後，政學會就倡議改組軍政府，成立合議制，到民國七年四月，軍政府果然改組了，所謂改組，就是排出中山先生，因爲，當時中山先生對護法的態度非常堅決，而且，政學會的陰謀已被中山先生看出來，曾經加以反對，所以，政學會非常討厭中山先生，改組的結果，成立合議制，將大元帥制，改爲七總裁的合議制，由非常國會推出中山先生，唐紹儀、伍廷芳、岑春煊、陸榮廷、唐繼堯、林葆懌七人爲軍政府總裁，而以岑春煊爲主席總裁，這就是以岑春煊代替了中山先生，中山先生被逼走了。

一羣無恥的讀書人

政學會控制了國會，排出了中山先生後，於是，乘機攬取要職，民國八年，廣東省長翟汪，因事去職，各派就展開爭奪戰，左派想擁護伍廷芳爲省長，軍人實力派則加以反對，結果，漁翁得利，政學系健將之一的楊永泰却不費力氣地得到了，軍政府副官長，則由張羣担任。當時政學會真是紅極一時，抬出岑春煊來做偶像，拉攏實力派，分化中間黨，排出左黨，控制了軍政府，如此聲勢大振，於是奠定了政學系的基礎。

政學會當時不像其他派系一樣，有嚴密組織，或者有什麼具體方針，牠後來之所以形成一系，活躍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就是中國近代的環境，封建殘餘勢力，依舊濃厚，帝國主義力量，十分強大，於是，一羣熱中於自己升官發財的讀書人，或者已經登台，則需要助手，如果沒有登台而自以爲「學成文武藝」急於出售的人物，亦得找個門徑，於是，你引我，我引他，臭味相投的人，在中國這樣的環境下，得到了發展的機會，因爲封建殘餘勢力需要幫兇來共治天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就需要走狗，讀書人如果無恥，熱中做官，不管主子是誰，是封建殘餘或者帝國主義，是幫兇或者走狗，祇要自己能向百姓搜括，站在百姓頭上，都願效勞充任的，而中國正不缺乏這樣無恥的讀書人，於是，物以類聚，政學系遂漸形成了。當時以李根源爲中心，黃郛、楊永泰、張羣、吳鼎昌陳儀等亦都先後加入了。

二 政學系的活動

做了軍閥的寵兒

在軍政府時代，政學系紅極一時，但是，好景不常，政學系甘願犧牲革命目的謀與北方軍閥妥協的陰謀，日益顯露，國會中間派議員看破這一點，漸與左派結合，政學系因此逐漸失去控制國會的能力，原受李根源控制的滇軍，此時也不受指使，政學系聲勢因此漸衰，政學系參加軍政府本來就不是爲了護法，這時，左顧右盼，覺得還是回到北方，去和軍閥打交道吧！

當政學系主力還在南方時，就預防到自己將來的退路，所以，曾經用軍餉去幫助吳佩孚，收回湖南的地盤，而且，挑動起直皖戰爭，爲自己製造了接近軍閥的機會。所以政學系回到北方後，馬上和軍閥勾結，吳佩孚、曹錕重用他們，像李根源在張紹曾內閣出任農商部長，黎元洪也信任他們，當黎被「逼宮」時，就委任李根源做內閣總理，吳佩孚、曹錕傾倒，他們的官運並無影響，黃郛就代李根源出來，成爲一系的中心，做過內閣總理，且自兼外長，開始和帝國主義勾結，政學系健將之一的張耀曾出任司法總長，而張羣等也被重用了。

後來，段祺瑞出任臨時執政，於是政學系要角劉鎮華就聯名齊燮元等通電擁護，舊主重逢，自當重用，政學系官運亨通，於是拉攏北方財閥，聲勢較前更盛了。

到革命陣營裏投機

在政治活動上，政學系扮演出各種各樣的角色，出現各種各樣的面貌，但是，他們的存心和他們的目的祇有一個，他們從李根源開頭，一直就不忠實於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他們祇會施展爛熟的政治手腕，來依附各種既存勢力，長袖善舞，圖謀自己的發展，所以，從不放過任何一個有利於自己的機會的。

國民革命軍於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在廣州舉行北伐誓師，北伐軍的進展，因爲得到廣大國民的擁護，節節

勝利。不到兩個月，北伐軍第七、第八兩軍就佔領了漢口、漢陽、武昌，控制了中國的中心區，北伐軍的第三、第六兩軍，於十一月佔領南昌，北伐軍的聲威震撼了北方。

當時政學系黃郛、張羣等雖在北方，但是，和北伐的軍事領袖，却保持着關係，黃郛即黃鵬白，畢業於日本東京陸軍測量學校，與當時的蔣總司令，先後同學，在陳其美做上海都督任內，做過參謀長，蔣任團長。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砲兵科畢業的張羣，當時任滬軍都督府科長，他們不僅有同窗之誼，而且還有着僚屬與同僚的關係，兼之黃郛爲人機警，謹慎，從不露面，有人稱他是「隱身仙人」，張羣也以機警著稱，並且含蓄，深沉，他們看到北伐軍勢雄壯，並且北伐軍總司令不是別人，正是自己共過事的同學，而且這位總司令的性格，是他們所熟知的，他們曉得這又是一個絕好的機會，於是，遂紛紛南下。

促成革命陣綫的分裂

正當北伐高潮的時候，張羣就從北洋軍閥的幕僚羣中走出來，走向南方，但是他並不到真正革命基地的武漢，而是直接走到北伐軍事大本營的南昌，進入北伐軍總司令的幕僚羣裏，當了一名總參議，那時，總參謀是李濟琛將軍，但李濟琛始終沒有到任，始終領着第四軍在前綫，因此，張羣儼然代行李濟琛的職務，作了實際上的參謀長，接着政學系健將之一王伯羣，也混入北伐軍裏，拉攏其妹婿何應欽，而且，號稱「隱身仙人」的黃郛、楊永泰等亦都來了。

自北伐軍攻下武漢後，繼又取得江西與福建，正在這個時候，武漢發生了從未有過的猛烈的罷工運動，當時武漢總工會之下的工會會員，自北伐軍到達不到兩個月，就擴大到三十萬人，工會單位擴大至二百左右。在十六年，十七年春，武漢自郵務、印刷、紗廠、銀行職員，直至店員手工業工人，無不捲入罷工浪潮，這一件事震動全國，影響於世界，英國議院因此事引起了討論，在日本政府機關報裏，竟對國民政府提出了警告，在國內那些地主階級，買辦階級，以及大資產階級，也大大震動，組織了「生產協會」，以保衛自己的利益，而且奔走相告，斥責國民政府不當援助工人，高呼國民政府「赤色」。由於當時兩湖工農革命運動的發展，武漢實際上已成爲革命中心的所在地，以此革命中心來發展全國革命的運動，和領導全國革命戰爭，是非常正確的。

，所以民國十六年三月七日國民黨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武漢舉行，就決定遷都武漢，並且，還通過了『軍事委員會大綱』，與『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條例』，以及決定將政治、軍事、外交、財政等大權集中於黨，並且改選常務委員九人，另舉軍人部長與組織部長，重新選舉軍事委員會十五人，改用主席制，這些決定原是國民黨本身符合革命形勢的決定，是削弱軍事領袖獨裁的權力的決定。但是，這個民主決定，是不爲帝國主義者，以及國內那些買辦，地主，財閥所歡迎，甚至於還十分討厭的。於是他們就聯合起來施展其陰毒的挑撥離間政策了，他們就利用遷都問題來促成當時軍事首領與武漢的分裂了，並且還計劃着在東南建立起反革命的根據地，以便與武漢對立，在這個歷史的轉捩點上，政學系又忠心耿耿地盡了幫兇的職務。

「北伐」被出賣了

自張羣等入帷後，總司令部每禮拜一的紀念週上，蔣總司令作軍事報告，在逐次的軍事報告中，已可看出北伐戰略戰術上有了改變，最大的改變，便是北伐軍的路綫，北伐路綫原有三條，一條由四川繞道陝西，一條由中路沿平漢綫直進，另一條由江浙沿海進攻北方，選擇路綫的時候，認爲第一條繞道太多，費事很大，是爲中策，第三條則須通過上海，而上海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圈，又是江浙財閥的大本營，爲了集中力量北伐，勢不能得罪帝國主義，與江浙財閥，故決不能擇此下策。因此，惟有中路是上策，乃決定選定中路爲北伐路綫，但當時的軍事領袖並不如此打算，又加上黃郛、張羣、楊永泰之流的策劃，不走已決定了的北伐路綫，而走下策了。派白崇禧以前綫總指揮名義將孫傳芳餘部改編的新編第一、第二兩師人進攻江浙，直指上海，這路綫的改變，是北伐變質的起點，是存心和帝國主義及江浙財閥勾結妥協的準備。因爲走這條路綫，決不可能同帝國主義及財閥爲敵，那只有與帝國主義與財閥們妥協甚至勾結之一途了。

同時，張羣在那時的每次會報上，常常對同僚及下屬說出下列的話：「過去。鬧革命的人替工農無產階級助長了不少威勢，今後，我們革命者應該替資本家說話，做做事了」。槍斃顧工會議主席贊賢，就是北伐變質的實例，也是張羣等所主張改變北伐路綫，策動出賣北伐的結果。北伐路綫的改變，也就是革命的北伐的變質，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政治「南伐」了。

三 政學系所幹的勾當

做帝國主義走狗

那時，黃郛他是一個十足的帝國主義者與反革命的陰謀家，他利用軍事首領個人英雄的慾望，迎合這位專制領袖的野心，於是努力促成南昌與武昌間的分裂，及至在他領導下，製造有名的「四一二」慘案，屠殺上海工人羣衆後，武漢政府乃以屠殺民衆，摧殘黨部爲理由，免去蔣中正總司令本兼各職，於是，蔣在六月十八日在南京另行組織國民政府了。這就是「寧漢分裂」，而這分裂，正是帝國主義者以及反革命者所歡迎的。是政客黃郛之流，挑撥離間所成功了的。

黃郛製造了「四一二」慘案後，彈冠相慶，得到了上海市長的職位，在這以後，他是當時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長，在他外交部長任內，曾辦理了很多屈辱外交。這是政學系甘願作帝國主義走狗，出賣國家利益的開始。當蔣中正率領的北伐軍到達了南京的時候，英、美、日、法等帝國主義國家，十分惶恐，所以戒備極其森嚴，南京一部份狂烈的民衆與士兵則十分憤怒，於是，就在各國使領館前舉行大示威，這些帝國主義國家的領事竟藉口保護僑民及領事館，下令停泊在下關江面的各國軍艦於三月二十四日夜開砲向南京轟擊，毀屋甚多，軍民死傷達千餘人，事後五國領事反聯合向武漢國民政府提出抗議，作種種無理要求，而置中國千餘死傷軍民於不問，當時，武漢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曾予駁覆，到民國十七年四月，南京政府成立，外交部長黃郛却與五國訂立協定，聲明「此案之發生，實由於共產黨之煽動，但中國政府仍負其責，肇事人業已懲辦，對美國政府有不敬之處，及領館僑民之損失，深表歉意，並担負繼續切實保護之責。」這種屈辱外交，無異對於帝國主義國家說：「你們放心好了，我們會聽從你們的」。

劊子手幫兇——楊永泰

當南京政府打定了天下之後，統治天下，自然也就少不了政學系了。所以張羣繼黃郛之後，做了上海市長，旋任湖北省主席，黃郛做華北政務委員長，黃紹雄做浙江省主席，熊式輝做江西省主席，劉鎮華做安徽省主席，而吳鼎昌，以四行儲蓄會與大公報的雙層關係，亦拉到南京做實業部長了，張公權即張家璈，以南方金融領袖的資格，出任鐵道部長，思想頑固的陳儀，做了福建省主席。而楊永泰却做了十年內戰中的剿共總司令部的祕書長。

提起楊永泰是很少人不知道他的，在南京政府成立以後，他佗際無聊，想當立法委員却遭胡漢民的反對而沒有成功，此時正當國共正式分裂，政學系加入國民黨。又在剿共戰爭裏大顯身手，博得主子歡心了。

楊永泰此時經熊式輝的援引，接近了蔣委員長充任南昌行轅的祕書，那時，南昌行轅是剿共的大本營，蔣以一身總攬黨政軍三權，日理萬幾，忙得不可開交，蔣氏引為最痛苦的事，莫過於批閱盈千累牘的公文了。但公文一到楊永泰手裏，繁的即變成簡單，他將全文核要之處用數十字至百字重行敘述一過，以他的才學文章，當然辭簡意賅，毫無疑義。然後，他擬定上中下三個批答的辦法，寫在同一張紙上，附在來文裏面，呈到蔣氏手中，他擬定的辦法，很少不合蔣的意思，從此蔣大為省力，覺得全行營的祕書，連祕書長在內，沒有一個人及得上楊永泰的，因此把他擢升為祕書長，於是事無巨細，都要經過楊永泰的手。楊做了祕書長，事將更為小心，蔣在江西剿共不利，常於中夜起身，繞室行走，楊永泰總睡在蔣的室外，聞蔣起身，他即驚醒推門進去，問委員長有何要事，蔣亦樂於與他商議，此時他善觀氣色，適時會提出迎合蔣的意見，他更能體認聖意，懂得中國封建領袖的心裏，所以，頌揚封建意識提倡復古的新生活運動，就是他的得意之作，新生活運動的目的就是號召中國的地主資產階級，擁護南京政府的剿共政策，加強舊秩序的統治，鞏固獨裁者的地位。比這更毒辣的保甲制度，也是楊永泰所倡議的，保甲制度，遺毒至今，仍令人談虎色變，使人萬分厭惡，這制度，實際上是加強剿共的軍事活動，而且對人民的控制，是愈加緊不放了。

楊永泰對於政治是有野心的，他像煞有介事的孜孜不倦，他熟悉中國近數十年來政治的「暗盤」和「底帳」，他有五花八門的政治戲法，他能窺測長官的最深心裏，而獻出錦囊妙計，這都是他比人高明的地方，然而，可惜他仍是一個高等紹興師爺，學問上的修養太淺，品格太壞，不足以看出中國政治上的病根，所以，儘管

他才氣縱橫，大刀闊斧，但是他所想出來的，祇是幫助統治者的鎮壓人民，屠殺人民而已。

由於蔣對他的寵愛，結果引起了蔣底下CC系的嫉妒與反對，而終於被刺殞命。

包辦親日外交

政學系對主子的效勞，不僅在對內屠殺人民這一點上，有過很好的貢獻，就在對外向帝國主義獻媚妥協這點上，人才濟濟，也有過非常卓越表現。所以有了黃郛，而且還有了張羣。

原來，統治者對內專制獨裁，對外就屈辱賣國，當國內剿共戰爭正進行得熱烈的時候，日本也就乘機向中國節節侵略了。

日本先發動「九一八」事變，囊括東三省全境，繼之有「一二八」淞滬之戰，日本結束這個侵略步驟之後，跟着向長城以南擴展其勢力，之後，企圖囊括華北冀、察、綏、晉、魯五省主權，先有「河北事件」，後有「冀察事件」，提出華北特殊化的口號，製造偽自治運動，隨着日本帝國主義這種貪得無厭，得寸進尺的侵略，中國人民已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愛國運動也隨之洶湧澎湃起來了，但是，那時的政府當局，仍在積極進行這沒有結果的剿共戰爭，而對外，則主張「長期準備論」，對日妥協於是政學系的親日外交，也就被南京當局所倚重了。

在北方，長城戰役後，黃郛去「跳火坑」，出任華北政務委員長，當時幫助他對日談判的殷同聲即殷同、陶尚銘，以及袁良等，也都是政學系人物，民國二十四年，何應欽與日本天津駐軍司令梅津訂立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參與談判的，有熊式輝、陳儀，而熊陳兩人，也都是政學系的健將，在這個時候，政學系除包辦了全部對日外交，而且，還在民間成立了中日經濟協會的組織，這個協會在中國方面的會長就是那位以四行儲蓄會與大公報起家的吳鼎昌，理事有陳介等，這也是屬於政學系的。後來，吳鼎昌出任實業部長，會長就由金城銀行首席經理担任。

民國二十四年，日本發表有名的廣田三原則，即一、威逼中國抗日運動，二、承認偽滿洲國，三、簽訂防共協定，這像三把尖刀，戳在中國心臟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至此達到最高階段，中國民族的危機，

瀕臨滅亡的前夕了。

但是政府還不想積極抗戰，還想利用這批「親日外交家」促成對日妥協，所以第二年行政院改組，就由張羣出任外交部長，當時張羣也很想有所成就，所以十分賣力。他倡導「長期準備」，實質上，即變相的妥協，不抵抗主義的復活。

在中日戰爭發生的那一年，全國已充滿了抗日救亡的呼聲，那時金城銀行的周作民，連同北方與政學系有關的財閥，則努力推動中日經濟合作，抗戰爆發後，周作民就出任偽政府的經濟委員，而且，私設電台，與重慶保持聯絡，汪精衛離開重慶時的交通工具，就是政學系理財家張家璈所供給，政學系後來雖在後方，但和日本，仍有聯絡的。所以無怪日本軍閥和偽組織都如此說：『將來「東亞和平」少不了政學系的』政學系的一貫媚外，於此可見了。

等待時機

抗戰爆發，全國振奮，當時，一般人都說：「楊永泰不死，中國抗戰發動不起來」，所以政學系受到了全國人民的唾棄，於是政學系在當局的袒護下，暫時隱藏，退向後方去了。這也是政學系厲害的地方，他們見風轉舵，最能善變，況且，他們究竟是一個有歷史的政治集團，政治資本雄厚，夾袋裏的人才比其他派系多，他們還有一張很有權威的報紙，這就是『大公報』，說話技巧非常高明，有時候說得當局心癢難熬，有時候先意承志，叫人看了打心眼裏舒服，有時候若即若離，會心不遠，有時候小罵大捧，動人愛憐，當時黨軸非常需要這樣一種非官方而又代表了官方的報紙，依靠這些資本，一到時機成熟，於是政學系又見重於當局而紅起來了。

這所謂時機，就是在「新四軍事變」之後，這事變充分說明了原以積極姿態領導抗戰的政府，對抗戰的意志動搖，對抗戰中強大起來的新四軍則加以岐視了，當時，政學系還看透了當局有意要和日本談和的企圖，所以，極力獻策，有名的「香港談判」，就是由政學系出來領導，而『大公報』張季鸞也參加了的。由於當局的不堅決抗戰和對抗日隊伍的殺伐使得國共分裂，則政學系的再起，是必然的了。因為在這些對內對外的反動政策上，政學系是有豐富的經驗的。